

張謇的政治思想

孫順智

銘傳大學共同學科專任副教授

摘 要

張謇 (1853-1926 年)，江蘇南通人。雖然關於張謇的作品已有不少，見證出其在近代中國的重要角色，但是有關張謇政治思想的系統著作仍然十分有限。本文以張謇日記、張季子九錄等原始資料，以及其他有關文獻，對張謇的政治思想作系統、清晰的研究。其目的在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者參考，並期拋磚引玉，冀學者作更深入的研究。

張謇政治思想可以簡單歸納為：(一)、實業為教育之基礎。(二)、實業、教育為自治之基礎。(三)、自治為立憲（後轉為共和）之基礎。而其政治思想的目標則在求中國的富強。

張謇政治思想亦可以歸納成七大原則：(一)、兼顧基層建築與上層政治結構。(二)、精英主義。(三)、實利主義。(四)、有限度改變的觀念。(五)、漸進主義。(六)、中庸之道。(七)、民治。

至於張謇政治思想的背景、淵源，思想的形成與變遷之過程，時代意義，以及對現實政治的影響，本文也都有慎重的處理。

關鍵詞：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現代化、實利主義、實業、自治

壹、緒論

緒論部份將對有關張謇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張謇之基本資料做一番討

論，並以張謇為例，討論儒家傳統與現代化是否相符這一爭辯激烈的課題。隨後並以簡圖說明張謇的政治思想。

一、張謇政治思想研究成果的檢討及本研究之目的

張謇，江蘇南通人。雖然關於張謇的研究已有不少，見證出其在近代中國的重要角色，然而有關張謇政治思想的系統著作仍然十分有限。張孝若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1930)，包含不少基本資料，是首部有關張謇的著作。但是該書組織鬆散，對張謇政治思想的討論流於膚淺。宋希尚的《張謇的生平》(1963)，與其說是傳記，不如說是張謇文章集註附加宋氏個人對張謇的追憶，甚少討論張謇政治思想。劉厚生的《張謇傳記》(1958)多討論張謇時代的政治事件，對張謇政治思想則甚少討論。Samuel C. Chu (朱昌峻)的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 (1965) 強調張謇在實業、教育、農墾、水利方面的角色，以及對國事的參與，但甚少討論張謇政治思想。章開沅的《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1986)詳述張謇的生涯及政治活動，甚少觸及政治思想。King-kong Wong (1957)，陳志讓 (1983: 2285-2307)，徐崙 (1962:408-425)，李時岳 (1962)，陸惠風 (1962)，王爾敏 (1985:5-30)，楊福輝 (1970:27-42)，P'eng-yuan Chang 張朋園 (1968:143-183; 1969)，Sheng-hsiung Liao 廖勝雄 (1979:249-289)，朱志騫 (1972)，陸寶千 (1986:615-639)，瞿立鶴 (1976)，陸耀東 (1980:687-700) 等人，均曾為文討論張謇，但未深入研究張謇的政治思想。

本文對張謇政治思想體系及各環節間的關係作系統、深入之研究，意在對此偏缺，或有少補。而依據原始基本資料爬梳整理，將張謇政治思想歸納為：「實業為教育之基礎；實業、教育為自治之基礎；自治為立憲（後轉為共和）之基礎」，並以簡圖表示，係屬創舉，實為深具創意之研究成果。本文目的在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者參考，並期拋磚引玉，使學者對張謇政治思想作更深入之研究，俾能對學術及政治有所助益。本文並以張謇為例，隨時討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問題，證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並非完全相衝突。

二、基本資料

本文儘量使用原始基本資料做爲寫作根據。張謇的《柳西草堂日記》(1986,以下簡稱《日記》)爲最基本的資料,自1873年10月24日張謇20歲3個月又23天起,至1926年8月2日張謇去逝前22天止,約五十三年時間。本日記大約八十七萬五千字左右,從日記中吾人可以了解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之生活,並可以檢正張謇一些著作的正確日期。

張怡祖(孝若)編,張謇著的《張季子九錄》,(1983,以下簡稱《九錄》)是了解張謇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九錄》依主題分爲政聞錄、實業錄、教育錄、自治錄、慈善錄、文錄、詩錄、專錄及外錄九部份,各自主題依年代順序收錄。

《張謇存稿》(楊立強、沈涓濱等編,1987)收集了張謇致趙鳳昌、袁世凱的未刊函件及電報,張謇致張孝若的家書,翁同龢致張謇函,以及曹文麟的張季子九錄校補稿等,爲甚有價值的基本資料。

三、儒家思想與現代化未必不相合——以張謇爲例

儒家傳統與現代化是否相衝突這問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萊特(Mary C. Wright)認爲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完全相反:

同治中興的失敗顯示出,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之下,有效率的現代化國家也無法移植進入儒家社會(Mary C. Wright, 1957:300)。

她下結論說:

同治中興的失敗,是因爲現代化的要求與儒家社會的要求完全相反——現代化成功的障礙並非帝國主義的侵略,滿族的統治,官員的愚昧或歷史的偶然,而是儒家體系的構成要素(Mary C. Wright, 1957:9-10)。

假若 Mary C. Wright 所指的「儒家體系」是絕對服從和關係取向的部份，她的「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相反」的結論是相當有道理的。然而所指的「儒家體系」若是指實利的和互惠的儒家思想，則 Mary C. Wright 的結論則是錯誤的。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是現代化的障礙：

中國人在現代史上的經驗是：由於無力與西方國家平等相與，而遭逢太多的挫折與不確定。中國人社會遺留下來的制度使他們出了問題。較諸其它成熟的非西方國家，中國似乎比它們更無法適應現代生活的條件。民族主義和工業化在日本相當成功，但在中國卻是失敗。科學方法、法治，或是發明家、企業家均無法在那奇特的社會中全盛。也許是中國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過於成熟、穩固以致構成此等障礙。中西差異過於根深蒂固，因此唯有徹底打破舊秩序，中國才有適應現代世界的可能。中國社會必須丟入熔化爐，中國人必須接受革命為生存之法則，因為現代化的過程涉及社會生活與實踐各面向迅速、劇烈之改變 (John K. Fairbank, 1953:4-5)。

Albert Feuerwerker 謂中國傳統社會及其價值體系，與現代化的要求相違：

官督商辦制度實際上與傳統制度和行為模式相妥協。它試圖提供一個媒介，使建立在前科學、農業密集社會之專制政體和儒家思想，能夠適應現代企業和溝通方式的需要。但是晚清時期在中國萌芽的現代型態企業，並未發展為「工業革命」。或許由此可得到一個最好的教訓：制度的突破，勝於在傳統社會及其價值體系內，所建立的衆多紡織廠、造船廠 (Albert Feuerwerker, 1968:242)。

相反的，呂實強則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完全相合：

儒家傳統並不曾構成維新的障礙；相反的，許多知識分子卻憑依此一基礎而能對外方傳來的新事務、新知識，客觀的加以衡量，而後擇優吸取，融匯入自己原有的傳統之中，進而創生新設計、新構想，並毅然去付之於實行。這足徵儒家傳統，不僅對外來文化，具有兼納並容的優長，並且也富有融會貫通、綜合創新的動力。因此，我們要推行國家的現代化，儒家傳統，顯然仍為一項重要的憑藉與基礎（呂實強，1980:83）。

Saundra Sturdevant 也說：

依吾人研究，儒家思想本身絕不是現代化的障礙，反而是邁向現代化所需要的信心和力量的基礎（Saundra Sturdevant，1976:67）。

平實而論，說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完全相違，或說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完全相合，皆不合理。事實上，儒家思想成份中的「為民服務」、「互惠」、及「富民」、「教育機會均等」之「實用」概念均與現代化相合。但是「絕對服從」及「依賴長上」等概念，極易抹煞個人創新和意志自由，確實與現代化相違。因此孫廣德作出結論說：

負責、殉職，不辱使命，與顯揚父母、光耀門楣、力爭上游，對西化或現代化應該是有幫助的，至少不會有什麼障礙。而念舊、崇古、趨向保守，與認同權威、缺乏獨立精神，對西化或現代化則必然是有阻礙的。……中國傳統文化……有些或有的方面有時可促進西化或現代化，有些或有的方面有時可阻礙西化或現代化（孫廣德，1982:187-189）

I-fan Ch'eng 也說：

許多人或可接受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相違這一論點。吾人則認為這一

論點實為誤謬。事實上，有些中國傳統的價值和態度不但不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反而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 (I-fan Ch'eng, 1976:170)。

依吾人觀點，儒家思想的原始型態包含「為民服務」、「實用」、「互惠」，也含有教條。「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篇)是儒家「為民服務」的崇高理念。孔子雖然強調道德，但也注重人民生活之改善，及教育機會之均等，故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篇)，又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篇)，此為儒家「富而教之」的「實用」觀念。儒家強調「正名」，卻是建立在「互惠」之上，而非絕對服從。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卻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而強調「互惠」。孟子在解釋先王如何舉用賢才教導民眾五倫時，更清楚指出了「互惠」：「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篇)。

但是自漢代，特別是宋代及清代以後，儒家思想漸漸教條化，被統治者濫用，成為統治民眾的工具。人倫關係被解釋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這種絕對服從的說法實際上與儒家思想真正價值相違背。在西方人眼中，晚清時代的儒家，變成僅是腐敗、貪污、無人道、頑固和迷信的象徵。儒家思想「實用」、「互惠」的原始精華早就消失一空。

然而，張謇強調儒家思想中的「為民服務」、「實用」、「互惠」成份，並實踐力行之。依循儒家思想「為民服務」、「實用」、「互惠」的概念，參酌中國實際狀況，張謇逐步發展其富強救國的政治思想。首先，實業救國；其次，實業、教育救國；再次，實業、教育、自治救國；再發展為在君憲下，實業、教育、自治救國；最後接受共和之下的實業、教育、自治救國。張謇確實對中國經濟、教育和政治的現代化有極大貢獻。張謇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實例，足以證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並非完全相衝突。因此 Samuel C. Chu 說：

顯然，改革家張謇是務實儒家學者的代表。他親自對儒家思想的精華與糟粕作出區別。在其有生之年，拋棄教條，將儒家思想精華付諸實踐。……張謇不認為儒家思想與中國工業化、全民教育和地方

自治的推行，有任何衝突之處 (Samuel C. Chu, 1965: Preface XII & p.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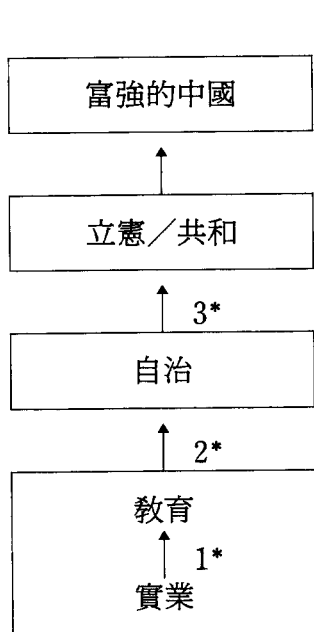
蕭公權也說：

張謇以一介儒家士大夫，於十九世紀末期轉變為改革家及實業先鋒而卓然有成，證明了傳統主義與企業精神並不一定相衝突 (Kung-chuan Hsiao, 1975:353)。

四、張謇政治思想簡圖

張謇政治思想可以簡單歸納為：實業為教育之基礎；實業、教育為自治之基礎；自治為立憲（後轉為共和）之基礎。而張謇政治思想的目標則在求中國的富強。

圖 1 張謇政治思想簡圖



說明：

- 1*實業是教育的基礎，因為教育經費需由實業所得來支持。實業，依張謇之見，包含農、工、商。略相當於現今所謂的「經濟發展」。實業是教育的基礎，而教育也可以增進實業知識，兩者關係密切。張謇視實業為教育經費的手段，同時也視實業為富強救國的手段。
- 2*實業和教育是自治的基礎，因為它們是自治的必要部份。教育，依張謇之見，並非只是「教導」，而是使人民啟發智慧，獲得知識、學問的方法。張謇認為，富強救國必須依靠知識，而知識之獲得，來自教育。實業和教育是富強救國之大道。
- 3*自治是立憲（後轉為共和）的基礎，因為無論立憲或共和，非自治無以成之。自治，依張謇之見，為人民在士紳的領導之下，從事實業、教育及其它地方工作，以奠定富強之基礎。立憲，依張謇之見，是在君主之下的三權分立政治體系。張謇自 1904 年至 1911 年一直熱心於立憲運動，但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個月左右，卻轉而贊同共和。張謇改變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認定實業、教育、自治在立憲或在共和之下，均可實踐。

貳、早期生涯，歷史背景與其政治思想的演進

張謇，字季直，號鬻庵，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七月一日）出生於江蘇省海門縣，一九二六年逝世於江蘇省南通縣。張謇的父親名彭年，先後娶葛氏、金氏。葛氏生長子譽，五子警，金氏生二子謨，三子察，四子謇。張謇的家族幾代以來一直是不識字的農家，其父張彭年則受過初級的教育，甚望其子弟將來能在科舉考試中成功。

張謇在 1856 年四歲時開始讀書，他的啓蒙老師即是他的父親，教他讀千字文。1857 年張謇被送到書塾，他的老師是邱大璋。在 1857-1863 年七年內，閱讀初級讀本如三字經，百家姓；基本詩文如千家詩、神童詩；以及儒學典籍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詩經等。這些書籍的學習，雖然只是初級的教育，卻是科舉考試的基礎。在這預備性的階段，張謇學習閱讀、寫作、書法，甚至對偶文。

1864 年，其父請宋效祁爲家庭教師，幫忙張謇兄弟準備地方科考。宋效祁命張謇重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不過版本較佳。接著，宋效祁教他書經、易經、禮記及左氏春秋。在宋師有效教導下，張謇學習科考所必須的試帖和制藝。不幸這熱心的教師於 1866 年去逝。張謇乃被送往西亭，接受宋師姪兒宋琳的教導。張謇繼續閱讀周禮和儀禮等儒學經典（《九錄》，專錄，卷六，頁二上至四下）。

張謇的科舉生涯是漫長和苦痛的。在第一階段生員考試中，張謇花了五年，1864-1868 年作準備，通過縣、州、院試，在院試中得到第二十六名，而於 1868 年獲得附生，當時張謇十六歲。

第二階段舉人考試對張謇來說，相當艱苦。他花了十七年，從 1869-1885 年去應考，失敗了五次。1870 年他初次參加此項考試，在科試中得到第十六名，但是在鄉試中失敗。在 1873，1875，1876，1879 年的考試中亦都在科試中通過，鄉試中失敗。一直到 1885 年，張謇才考上舉人，並獲得第二名。

第三階段進士考試，也是艱難萬分。他花了九年，從 1886-1894 年作準備，在北京舉行的進士考試中，1886，1889，1890 和 1892 年連續失敗了四次。

在 1894 年，年屆四十二時，在父兄鼓勵之下，再次參加考試。會試排名第十六，覆試第十，而在殿試中則榮獲第一，狀元及第。隨即被任為翰林院修撰（張孝若，1930:22-29）。可是六個月之後，在張謇的科學生涯中扮重要鼓勵角色的父親即逝世，於是張謇決定棄官。四年後的 1898 年，當他在家鄉南通發展實業的時候也不忘回到北京參加翰林院的考試，完成了全部科考的程序。依張謇之意，此舉在於實現其父的遺願，告慰其父在天之靈。

經由傳統的訓練，張謇接受了儒家思想中的實用、互惠的成份，成為他以後從事實業、教育、自治及政治活動的精神指導原則。

1894 年是張謇一生的分水嶺。在這之前，張謇雖然也曾入孫雲錦、吳長慶幕，也曾擔任地方誌編輯、書院院長，但是張謇主要關心的，是通過科學考試。1894 年後，張謇的時間和精力則是用於推動和中國現代化有關的一些事業，包括實業、農墾、鹽政改革、導淮、教育、慈善事業、憲政發展等。1894 年以前的張謇，是傳統科學考試制度之下的傑出人物。但是 1894 年以後的張謇，則一方面能保存儒家傳統為民服務的中心思想，一方面又深具遠見、實踐力行而卓然有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開路先鋒。

張謇七十四年的生涯，見證了一連串的知識變遷及事件。包括了 1860-1894 年的自強運動，1898 年的百日維新，1900 年的庚子義和團，1905-1911 年的憲政運動，1911 年的革命，1919 年前後的五四運動以及 1921 年開始的共產黨運動。

在 1840-42 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她視自己為世界獨強而視其他各國為夷狄之邦。但是經鴉片戰爭及中英戰爭（1858-60 年）之後，她了解到中國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外國學習。而第一波的學習外國運動則為自強運動（1860-1894 年）。

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強調科技的重要，特別是船、砲、路、礦。他們認為中國如能學習西方科技，則可以打敗外國。自強運動在中央由恭親王奕訢領導，在地方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提倡。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了解器械是西方文明的動力，而思有以用之。但是他們缺乏整套的計畫去逐步推行，只是依據需要一件一件地做。他們認為西方的富強僅來自物質而已，仍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風俗都遠勝於國外，只有大砲、

鐵路、器械略遜一籌 (Teng, Ssu-yu, John K. Fairbank and others, 1954: 86)。

張謇對於自強運動之實際成效不感滿意，但是並不反對自強運動之增強軍備和發展實業的目標。早在 1879 年張謇即指出，「中國大患不在外侮之紛乘，而在自強之無實」(《九錄》，政聞錄，卷一，頁一上)。而在 1886 年張謇更指出「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須在士大夫」(《日記》，總頁 1987)。

在維新運動時期 (1895-1912 年)，康有為謂孔子是改革家，認為孔子所說的據亂世相當於君主專制；昇平世相當於君主立憲；太平世相當於民主共和；三者須循序漸進。康有為的這種闡述提供了古典能容納西化、儒家思想可以維新之基礎，而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相符合。

其他學者，例如張之洞，則認為立憲是與儒家思想相衝突的，但是認為儒家概念容許向外國學習器、物、技。張之洞想要以保留儒家三綱，發展實業、教育，和學習西方科技來救中國。張之洞這種以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礎作治國的依據，並採西方科技作實際之運用，被稱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張謇則認為儒家思想是與向外國學習長處相容的，主張可以學習西方的實業、教育、自治，蓋實業、教育、自治中國古已有之，無妨向西方學習。張謇也認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與張之洞相較，張謇所謂的體是原始的儒家，而非漢代，尤其宋明以後的儒家，因為他認為務實、互惠遠重於絕對服從。張之洞所謂的體則是漢代，尤其是宋明以後強調絕對服從的三綱。

1895 年馬關條約即將簽訂之際，康有為在北京領導公車上書。籲請政府拒絕簽訂和約，遷都再戰及作軍事、實業、教育等改革。當公車上書之時，張謇在南通丁父憂。不過，張謇稍後代張之洞上奏，提出九項改革：(1)宜練陸軍，(2)亟治海軍，(3)宜開鐵路，(4)宜省分設槍砲廠，(5)宜開學堂，(6)宜速講商務，(7)宜講求工政，(8)宜多派遊歷人員，(9)宜豫備巡幸之所也 (《九錄》，政聞錄，卷一，頁一四上至頁二二下)。這些建議事實上與萬言書內容相似。

自 1895 至 1900 年，張謇發展實業、教育相孳乳之思想。而這與上列改革事項中的(5)、(7)項相呼應。張謇日記 1903 年 5 月 24 日有載：「甲午後乃有以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之思」(《日記》，總頁 1987)。1898 年，康有為遊說光緒皇帝作軍事、實業、教育、公共行政，甚至於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而

張謇當時對於軍事、實業、教育的漸進改革並不反對，但是卻不贊同作激烈的政治改革。甚至於在軍事、實業、教育方面都屬意於點滴漸進的改革，以避免保守勢力之反對。

從 1901 到 1903 年，張謇發展出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之思想。而從 1903 至 1911 年，他發展出實業、教育、自治為立憲基礎之思想。此時張謇極力倡導立憲運動。然而辛亥革命後一個月左右，他發展出實業、教育、自治為共和基礎之思想。1913 年，他認為實業之命脈繫於政治，兩者彼此影響（《九錄》，政聞錄，卷七，頁一上，頁四上）。從 1913 到 1915 年，張謇主要於中央政府實踐他的政治思想，但自 1915 年之後至 1926 年逝世之前，主要於地方層次實踐他的政治思想。

1919 年左右的知識革命代表中國對西方衝擊的第三階段反應。第一階段 1840-1864 年的自強運動主要在於外交及軍事現代化；而第二階段則為 1895-1912 年的立憲及共和運動，進而強調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而 1917-1923 年則進而拋棄傳統束縛而思全盤西化。一些學者如胡適，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完全衝突而應予拋棄。受西方訓練或啓迪的新知識份子，倡導國民生活哲學基礎的激烈改變。他們要求依西方的標準重估中國的文化遺產，而決定接受西方民主、科學文化作為新秩序的基礎。此種知識爆炸，對儒家思想的傳統道德、風俗、人際關係及社會習慣都產生重大衝擊。在深度及廣度方面，五四時期知識轉型的影響，實超過 1895-1912 年時期。其他有些人如辜鴻銘、康有為，則仍堅持維持儒家思想，蓋其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可以相容。

五四運動時期，張謇仍然認為儒家思想的「教育機會均等」、「為民服務」、「實用」、「互惠」等概念符合現代化。張氏並不同意全盤西化及學生運動。他認為學生的主要任務在於求學，而非浪費寶貴時間於政治運動，學生的罷課只會引起社會混亂而不能實際地解決國家的問題（《九錄》，教育錄，卷四，頁一四上至一八下）。他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概念，也反對運用暴力的方式取得政權。

參、張謇政治思想的幾個大原則

張謇是真正的儒家學者，倡導在士紳領導之下，兼採西方的方法，以溫和、進步的方式促進中國現代化。他是中庸之道的人，喜歡點滴實在地去推動實業、教育和政治現代化。張謇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為七個大原則：

一、兼顧基層建築的實業，及上層結構的政治

張謇獻身於實業、教育、自治，以為立憲或後來共和的基礎。他認為實業和政治彼此關聯，而同樣予以重視。他說：

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政治能驅于軌道，則百事可為，不入正軌，則自今以後，可憂方大（《九錄》，政聞錄，卷七，頁一上，頁四上）。

二、精英主義

張謇認為知識份子乃國家之精英，有義務為民眾謀福利。他接受顧炎武經世致用之旨，認為知識份子必須關心國事，抱持「宇宙天下事，皆吾儒份內事，吾儒不任事，則誰人任之」之志，為民服務。他決心將其皮、骨、心、血奉獻於世，不為兒孫留下一牛一馬（張孝若，1930:345）。

三、實利主義

張謇認為士紳的智慧，應表現在實際的行動上，而非空言。他再次接受顧炎武經世致用之旨，認為「與其空言，不如見諸實行」。張謇認為，知識份子的主要任務，在於教民、養民。然而多數在位的讀書人，卻只謀求私利，而不能為民服務。因此張謇在 1882 年朝鮮壬午之役後即在家鄉先事農桑，且在榮獲狀元之後決定放棄官僚生涯，回鄉興辦實業、教育。而在日俄戰爭後立憲運動蓬勃之際，呼籲士紳帶頭發展實業、教育，作為立憲的基礎。他說：「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九錄》，專錄，卷七，

頁一四下)。

四、有限度改變的觀念

張謇認為「用」可以改變，而「體」（基本原則）則是永久不變。King-kong Wong 說：

張謇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都在改變中。數千年前建立的制度，如今必須改革或放棄，以迎合現實的需要。因此他要用西方的組織和技術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在他鹽政改革一文中，張謇談到，沒有任何制度歷千年而不產生流弊的 (King-kong Wong, 1957:27)。

張謇在實業、教育、自治、立憲、共和方面的主張，隨情勢的改變而有所改變，然而張謇對儒家思想中的「為民服務」的概念則始終如一，並無變遷。Samuel C. Chu 說：

其基本信念從開始主張辦紗廠到去逝，無所改變 (Samuel C. Chu, 1965:177)。

假如朱氏所謂的「基本信念」，指的是儒家思想中的「為民服務」的概念，則張氏「基本信念」從開始主張辦紗廠到去逝，確實是無所改變。然而張謇在技術、科學、管理、教育、自治，甚至於立憲、共和政治體系方面，則是一步一步變遷：首先是實業救國；後來發展為實業、教育救國；再發展為實業、教育、自治救國；再發展為實業、教育、自治、立憲救國；最後發展為實業、教育、自治、共和救國。所以，張謇的觀念，是有限度的改變觀念：在儒家思想中的「為民服務」、「實用」、「互惠」觀念方面，張謇始終不渝。而在實業、教育、自治、立憲、共和方面，則因時而變遷。

五、漸進主義

張謇認為最佳形式的政治運動是漸進的改革。他了解在任何政治行動都

必須有計畫和準備的階段。例如在 1898 年百日維新時，張謇同情康有為的改革運動，但認為百日維新的行動欠缺準備，不夠成熟。他曾不斷地提醒康有為，勿採取草率的行動，但康忽視了他的勸告。張謇在 1903 年東游日本後則力倡立憲運動，並以地方自治作為立憲的基礎，呼籲士紳在家鄉從事地方建設。這是他的漸進主義。

六、中庸之道

張謇認為，折衷兩極端的中庸之道，為最佳方式。據其了解，中國傳統與西方文明並無基本衝突。他認為可採中庸之道，在維護儒家思想的大原則之下，引進西方的技術與組織。張謇生涯中，似乎並無意識型態的衝突。他贊揚張之洞的勸學篇「意持新舊之平」（《九錄》，專錄，卷七，頁八上）。比較張謇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主張，吾人可以發現張謇所指的用，較張之洞所說的用，範圍較為廣泛。張之洞心目中的用，指西方科技、教育，並非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張謇所指的用，則包括西方的科技、教育、行政，甚至於西方的君憲及共和的政治制度。張謇所指體，也與張之洞不盡相同。張之洞所說的體，強調絕對服從，而張謇所指的體，則強調儒家思想中的互惠面、實用面。

七、民治

張謇企圖以民治代替官治。他認為官治是專制下的正常狀態。他抱怨中國過去數千年中，除了夏、商、周之外，官僚都無法為民服務。因此張謇一方面力倡立憲運動，一方面力倡自治運動。立憲運動志在轉移官僚的政治權力至地方士紳手中。自治運動則責求士紳從事地方的現代化建設。張謇所主張的民治，事實上是紳治。

肆、實業為教育之基礎

實業，依張謇之說，包括農、工、商各方面，略相當於現今所謂「經濟發展」。他在 1904 年 4 月 15 日說道：

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義兼本末，較中國漢以後儒者重農抑商之說為完善（《日記》，總頁 2159）。

張謇實業觀念的形成，始於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 年）。他說：

自丙戌會試報罷，即謂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
甲午後乃有以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之思（《日記》，總頁 1987）。

教育需要金錢支持，而金錢來自實業。張謇確信，現代教育的提倡是一切改革的基礎，然而他缺乏提倡教育所需的經費，因此他努力振興實業，作為教育的基礎。實業是教育的基礎，因為教育經費必須由實業來支持。他說：「必農工商奮興，而後教育乃能普及」（《九錄》，實業錄，卷二，頁九上）。又說：「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而非廣興實業，何以取資以為挹注」（《日記》，總頁 2099）。在大生紗廠股東會第一次演說中更說：

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擾，下復塞之，更無憑藉（曹文麟，1969：卷一，頁一上）。

1911 年又說：

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強。知識之本基於教育，然非先興實業，則教育無所資以措手（《九錄》，實業錄，卷四，頁三〇上）。

1912 年南通師範創立十周年時，也強調興實業為促進教育之手段（《九錄》，教育錄，卷三，頁一五下，一六上）。類似的話，在其一生中一再出現。如 1921 年：「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九錄》，自治錄，卷四，頁二上）。又如 1924 年：「教育必資於經費，經費惟取諸實業，所謂實業為教育之母是也」（《九錄》，政聞錄，卷六，頁一九上）。張謇視教育為富強救國的手段，而實業則為支持教育經費的手段。張謇不只是談實業，而且是親自辦實業。

實業是教育的基礎，而教育也可以增進實業知識，促進實業之發展，故曰：「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在，即教育之所在」（《九錄》，教育錄，卷六，頁八下，九上）。又曰：「實業教育互相孳乳」（《九錄》，自治錄，卷三，頁一五下）、「父教育而母實業」（《九錄》，教育錄，卷二，頁二七上），可見實業和教育密切不可分。張謇亦視實業為富強救國之根基，在1902年給通州商人的公開信中，謂「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完不張」（《九錄》，實業錄，卷二，頁九上）。張氏認識到農工商是整個經濟發展的相關面，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關係密切不可分，兩者均為富強救國之根基。

中日甲午戰後，1895年簽訂了馬關條約，日本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建立工廠之權。張謇適在南通守孝，在張之洞和劉坤一的鼓勵之下創辦大生紗廠，與日人競爭。經過不斷的奮鬥，創辦了大生紗廠及其它企業，其收益則用於辦教育。

伍、實業、教育為自治之基礎

張謇的愛國主義促使張謇興辦實業，以作為振興教育的基礎。張氏認為富強救國須先使人民有知識，而欲獲取知識，須賴教育。教育，依張謇之見，不只是教導而已，也包括如何使人民獲得知識、學問、智慧等各方面。張氏特別強調，實業、教育是富強的手段，而教育則是啟發人民智慧的關鍵。張氏更認為人民知識的增加有利於洗雪國恥。

張謇所說的知識、學問、智慧包括了解中國的危急，中國的急需發展實業，以及中國的急需發展新式教育。因此張氏認為知識、學問、智慧可有助於國恥之洗雪，社會平等之實踐，及自強之實現。

至於各種教育，張謇特重小學、師範及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意在培養實業人材，改良實業；師範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小學教師；而小學教育則為普及基礎的國民教育。觀其1903年之言可知：

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範始（《九錄》，教育錄，

卷一，頁一七上)。

張謇相信實業之發展可以促使國家富強。而欲作各種改革，也有賴實業提供財源以爲基礎。他相信教育可以掃除盲目、無知、偏見、固執等障礙，並造就各領域專家，促使國家富強。他明瞭實業發展與教育發展關係之密切，並親自興實業、辦教育。張謇認爲實業、教育是自治的基礎，他在一生中在不同場合下有多次申述。如 1906 年：

立憲之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爲自治基礎（《九錄》，專錄，卷七，頁一四下）。

如 1915 年：

國家之強本於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九錄》，自治錄，卷二，頁九下）。

又如 1919 年：

鄉里士夫，苟欲圖尺寸以自效者，當以地方自治爲務，地方自治條理甚繁，當以實業、教育爲先，蓋猶孔子富而教之之義（《九錄》，自治錄，卷二，頁二〇上）。

由以上諸條觀之，可知張謇認爲實業、教育是自治的基礎，也是富強救國的根本。亦可見張謇所說的自治，是在鄉里士夫領導之下，從事實業、教育等地方工作之自治。而從事實業、教育等地方工作，張謇把它看成是符合孔子富而教之意義，認爲傳統與現代化在此義上並不衝突。

張謇對教育的興趣自 1902 年至 1926 年從不中斷。他興辦小學、師範、農業、紡織學校及南通大學，對中國教育有實際的貢獻。張氏亦興辦女校，對傳統而言，也是一項突破。

陸、自治爲立憲之基礎

自治，依張謇之意，是在士紳領導之下，人人從事實業、教育及其他地方事務。由於士紳是民衆的代表，所以地方議會是地方自治之所必須。立憲，依張謇之意，是在皇帝之下的三權分立體系。爲了完成立憲，自治必須加強，因此，沒有自治，立憲就無法實現。

張謇認爲自治是立憲的基礎，他在不同場合中曾作此主張，如 1906 年：

立憲基礎，首在地方自治（《九錄》，政聞錄，卷三，頁一三上）。

又如 1910 年，他贊美清政府的地方自治章程說：

上諭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以地方自治爲立憲之根本，城鎮鄉又爲地方自治之初基（《九錄》，自治錄，卷一，頁一一上）。

雖曰上諭云云，實則張謇之見亦爲如此，因此 1911 年 6 月 13 日（宣統三年五月十七日）張謇又對攝政王載灃說：

因國家新政，須人奉行，故又辦地方自治之事（《日記》，總頁 1489）。

張謇經常是採取溫和、務實、一步一腳印的態度去實踐自治和立憲。他採取行動而不尚空言。他相信改革運動的成功基於政府和士紳的分工合作。政府的任務在於加強政治改革，亦即建立一個立憲政府；而士紳的任務則在於蘊釀社會改革，包括教育和經濟的進步，亦即實踐自治。在 1906 年，當他的同志在爭論立憲運動的進度時，張謇主張由政府倡行立憲。至於個人，則宜從事實業、教育、自治工作。他希望政府宣布立憲而士紳推展教育、經濟之現代化。他說：

立憲之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九錄》，專錄，卷七，頁一四下）。

張謇自治思想之形成，早在 1901 年變法評議中已見端倪。他建議仿日本設府縣議會，以議會開民智。他並指出，日本的議會源於周代（《九錄》，政聞錄，卷二，頁五上，五下）。把設府縣議會說成是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藉以維護中國人的尊嚴。

自治和立憲關係密切，彼此影響。自治之實施，也需要諮議局、國會與之配合。1909 年，張謇說：「地方自治之綱領，則諮議局也」（《九錄》，政聞錄，卷三，頁二五上）。1910 年更說：

稅則者，自治之根原，而人民之大命也。各國更定稅法，有不經國會協議者乎…自治之事…籌治須財，籌財須稅，籌稅須定系統比率，定系統比率須國會。有國會而後籌備有事，無國會直無籌備可言，此固不僅為地方自治言之也（《九錄》，自治錄，卷一，頁一三下，一四上）。

可見自治雖為立憲的基礎，但立憲的進展如何也會影響自治的成績。所以張謇主張由國會來決定稅則和稅率，使自治和立憲雙管齊下，同時進行。

張謇更認為地方自治必須逐步實踐，從個人、家庭、村鎮、縣、省乃至於整個國家。他在 1923 年說道：

地方自治云者…自一人一家一村一鎮始，治之而已。國無大，一家無小，視吾力所能，大不足矜，小不足餒也，亦行之焉耳。何取多言為（《九錄》，自治錄，卷四，頁一五上）。

張謇強調實踐力行和實際效果的重要，故建議地方自治必須要從最小的單位——個人——做起，逐步推廣到全國。依張謇之意，當每個人都能自治時，

那麼家、村鎮、縣、省甚至全國，自然能實踐得很好。

張謇贊成真正發掘人才力行建設的地方省務，但並不對於 1920-1924 年流行的所謂聯省自治有太大興緻。在 1921 年給聯省自治推動者徐佛蘇的信中，張謇說：「省各自治而后能聯」（楊立強、沈渭濱等編，1987:332）。在答湖南省督趙炎武之信中，張謇也表示自治的實際成績比聯省之名來得重要，如果「省不各自治何以爲聯」（《九錄》，政聞錄，卷五，頁一三下至一四上）。因此張謇真正關心的是自治，而非有名無實的聯省自治。

張謇所謂立憲，是指召開國會，成立內閣，與制定在皇帝監督之下的三權分立憲法。早在 1901 年變法評議中即有置議政院一條，議員由四五大臣命之，此四五大臣本身也是議員，議政院的功能是計劃各種改革（《九錄》，政聞錄，卷二，頁一下至二上）。當然此處所謂的議政院權力有限，而其議員爲四五大臣所任命，不能與現代國會相比。

1903 年張謇東游日本，認爲立憲不可緩。回國之後有機會即與友人討論憲法之事。在 1904 年日俄戰爭期間，張謇寫信給袁世凱，力倡立憲：

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戚之誼。顧亦知國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李劍農，1959:233）。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張謇在此信中指出「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在 1901 年「變法評議」中，張謇不認爲有必要作政體改革，而此時已主張政體改革了。

1906 年張謇寫信給鐵良，謂「立憲之不可復緩固已」。並進一步指出日式立憲爲最適當模式。因「中日較近，宜法日。日師於德而參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觀其意而已」（《九錄》，政聞錄，卷三，頁一三下至一四上）。依據當時日本憲法，皇帝擁有絕對權力，凌駕行政、立法、司法部門。張謇建議採用日式立憲，部份原因是易使皇帝接受。在張謇及其他立憲者熱心推動之下，結果最後清帝下詔預備立憲。

1909 年 12 月張謇任江蘇諮議局議長時，召開十六省代表聯合會於上海。

請願早日召開國會，成立內閣，以紓國難。他說：

痛外侮之劇，部臣之失策，國勢之瀕危，而人民之不可一息即於安。…於是合謀上書，請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九錄》，文錄，卷一〇，頁九下至頁一一一）。

代表團急入北京，在1910年1月26日，7月22日，及10月3日三次請願。結果在1910年11月，滿清政府被迫減短預備立憲期限，允許1913年召開國會，並於國會召開之前成立內閣。

柒、從君憲轉為共和

張謇如此熱心於君主立憲，但是卻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個月左右即轉而贊同共和。何以改變？對於這個問題張謇說：

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者，趨勢然也（《九錄》，政聞錄，卷三，頁四〇下至頁四一上）。

至於當時中國人作為共和國民的水準夠不夠之問題，張謇樂觀的說：

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製造而成。國民程度製造品也，政治則機器。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九錄》，政聞錄，卷三，頁四三上）。

張謇誤引老子及盧梭之言以支持共和，他說：

路索謂國土過大，則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長莫及之虞。老子謂治大國

若烹小鮮，此中國國土過大，宜於共和分治之說也。大抵君主立憲最宜於國小而血統統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孫萬世一系是也。民主共和最宜於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為聯邦，美之四十八州為合眾國是也（《九錄》，政聞錄，卷三，頁四一下）。

張謇對於盧梭的政治理論知之甚為膚淺，事實上盧梭認為小國宜共和，大國宜君主。而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根本與共和無關。雖然如此，張謇確實努力地解釋他何以從立憲轉為共和。

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也解釋張謇從立憲轉向共和，是因為考慮到公意所趨，及辛亥革命後之情勢，不得不接受共和以避免危亂（張孝若，1930:157-159）。

下列學者也分別作了解釋：章開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在1963年說張謇之所以轉變，乃因資產階級保護財產的需要（章開沅，1963:100）。然而在1986年改變觀點，說張謇的改變是因為其政治上的務實態度，對局勢的聰明判斷，及對時代潮流的適應（章開沅，1986:240-241）。徐崙及李時岳，也是大陸學者，認為張謇鑽進革命陣營，竊取革命成果（徐崙，1962:413；李時岳，1962:71-74）。陸耀東，臺灣學者，認為張謇所以改變是順應時代潮流（陸耀東，1980:687）。陳志讓認為張謇之改變是由於務實態度，包括考慮他財產的安全，聲望的維持，及其主張的前後一致（陳志讓，1983:2298-2303）。Chuzo Ichiko 謂張謇之轉變，正如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想從根本上去除災禍，以便保護自己，同時去尋求政治權力（Chuzo Ichiko, 1968:311-312）。Samuel C. Chu 認為張謇代表一群不直接參與革命，但也無意讓清廷延年益壽的人。先倡立憲後接受共和，視接受共和為救國手段，是當時一般士紳的共識。1911年11月的狀況，也讓張謇覺得清廷無可救藥，因此放棄立憲主張，轉而支持共和（Samuel C. Chu, 1965:69-75）。King-kong Wong 認為張謇的改變是其進步主義的自然發展（King-kong Wong, 1957:62）。張朋園謂張謇之轉變係由於立憲派認為立憲和共和在憲政理想方面並無根本不同。立憲派不希望看到中國混亂，同時也想自己控制局勢，因此從立憲轉向共和

(P'eng-yuan Chang, 1968:181-182)。

然而上述各學者均未能明確指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張謇思想上認為實業、教育、自治，在立憲或共和之下，皆可發展。張謇一直從事實業、教育、自治工作，因此適當的經費及穩定的社會對他來說極為重要。他最關心的是營造適當的環境以發展實業、教育、自治，因此他自然會考慮到財產安全及社會穩定。張謇有傳統士大夫的榮譽及責任感，思有以參與並控制局勢以避免動盪。他認為救中國最佳之策，乃是支持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交換清帝之光榮退位。因此，他自無法避免涉及權力爭端。此外，他曾盡最後的努力忠告清廷作政治改革而不獲採行，使他絕望，亦是其轉變原因之一。再者，他在辛亥革命後與時賢在上海之討論，也影響了他。因此若說張謇的轉變，只是因為其個人維護財產、聲望及奪取政權的野心，那是不公平的。張謇的轉變更是由於其務實態度及政治上的彈性，使他在立憲或共和之下，皆能為中國實業、教育、自治之發展而奮鬥。而張謇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則是在思想上，他認為實業、教育、自治在立憲或共和之下，皆可發展。

辛亥革命是經由南北議和，調配各方權力、利益之後才成功的，因此辛亥革命可以說是議和革命。表面上，此次議和是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革命派的代表伍廷芳所達成。但在背後張謇卻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張謇與當時控制北方政府的袁世凱關係密切，同時也被革命派所尊重，因為他長年經營實業、教育有成，而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唐紹儀赴南方參加和平會議前，袁世凱私下叮嚀唐紹儀，凡事先問訊張謇的意見。議和在1911年12月開始，主要重點是談判如何促使清帝退位而由袁世凱擔任民國總統的議題。未幾，孫中山於12月25日回國，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並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聞訊，立即撤銷唐紹儀代表名義，但是談判仍繼續在上海趙鳳昌家進行。1912年1月10日張謇密電袁世凱，告以南方不得不建立臨時政府，以便聯繫各省，不過那只是權宜性的措施。並說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表示，在清帝退位後即辭職（徐崙，1962:422）。在1912年1月14日，張謇又密電袁世凱，謂「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九錄》，政聞錄，卷四，頁一上），再確定清帝退位後，袁世凱可以擔任大總統。經張謇與袁世

凱數密電聯絡後，在1月27日包括段琪瑞在內的47位北方軍隊領袖宣布贊同共和，而此舉有助於迫清廷退位（徐崙，1962:423）。

此時革命派的重要領袖之一的胡漢民找張謇起草清廷退位詔書，在與同事們諮商之後，張謇持草稿給胡漢民。胡氏在唐紹儀同意後交給袁世凱，隨後此稿稍經修改，便正式頒布，表達清廷願意禪位之意（張孝若，1930:144-145）。

南北議和期間，狄葆賢的息樓，和趙鳳昌的惜陰堂，是上海兩處立憲派重要領袖如張謇、程德全、湯壽潛，和革命派人士如黃興、宋教仁、汪精衛之密商處。張謇在南北議和中為關鍵性角色，和談代表重視他的意見，立憲派和革命派重要領袖都尊重他。經由張謇的幕後協調，滿清終於在獲得優惠條件下退位（陸耀東，1980:694-695）。如果沒有張謇的參與，南北議和或不會那麼成功的達成。

捌、結論

張謇是一個重實用、講中庸、尚實踐，採溫和路線的儒學憲政家。其政治思想的淵源一方是實用、互惠的儒家思想，一方又受國外憲政主義的影響。其實業、教育、自治觀念，係淵源於實用、互惠的儒家思想，也受到日本的影響。而其立憲及共和思想則受到日本及西方思潮的影響。

張謇對儒家思想中「為民服務」、「實用」、「互惠」的概念從未改變，而在實業、教育、自治、立憲及共和方面，則因時勢的不同，而有所變遷：首先是實業救國；後來是實業、教育救國；後來是實業、教育、自治救國；再後是君憲下的實業、教育、自治救國；最後則是共和下的實業、教育、自治救國。富強救國始終是張謇政治思想的目標。

張謇政治思想之基石的實業、教育、自治、立憲與共和之間，緊密環扣。其關係可以簡單歸納為：實業為教育之基礎，而教育也可改善實業；實業、教育為自治之基礎；自治為立憲（後轉為共和）之基礎，而立憲之進展亦可影響自治之成績。富強救國則始終是張謇政治思想的目標。

中國傳統並不太鼓勵實業發展和物質創新，但是張謇從傳統士大夫輕商

的背景中毅然進入了實業世界。如此作法，張謇與當時的官僚實業家如李鴻章及張之洞是不同的，他們依賴他人作企業經營，張謇則是身體力行親自參與實業工作。在中國早期的工業化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從軍事方面來看工業，而張謇則對民間企業更有興趣。

張謇視教育為自治之基礎，也視教育為救國的手段。雖然張謇缺乏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為知識而知識的概念，但他卻能強調實用主義、愛國主義及全民教育而有別於傳統。張謇的教育概念源於原始儒家思想中的實用及互惠因素，而不是宋明理學家的空談。他建立各式學校，並突破傳統，創立女校，對教育有具體的貢獻。蔡元培、胡適及五四運動諸教育家，倡導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等概念，並親自教學，對教育有所貢獻。而張謇則興實業、辦教育及從事慈善事業以為自治基礎，對於中國的貢獻並不亞於蔡元培、胡適等人。

張謇視自治為立憲或稍後共和之基礎。他親自為實業、教育、自治而努力，建設地方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孫逸仙及康有為也有自治為民主基礎的概念。但他們只有紙上計劃，不像張謇親自致力於自治之實現。

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相較，張謇所指的用較張之洞為廣。如前所述，張謇的用包括西方科技、教育、行政及君憲、共和政治體制。而張之洞的用只包括西方科技、教育，而非政治體制。張謇所指的體也和張之洞不同。張之洞的體強調絕對服從，而張謇所指的體強調儒家思想中的實用、互惠。

與五四運動全盤西化的概念相較，張謇是溫和者。如前所提，張謇反對學生罷課，因為他認為學生最主要的任務是讀書而非參與政治活動。他強調嚴格教育，而非自由思想。

大多數張謇的同時代人物對張謇的評價都極為肯定。例如其師翁同龢稱讚張謇極其聰明（趙中孚，1970:2177）。其弟子及朋友袁世凱尊張謇為立憲運動的理論領袖（張一麟，1966:卷七，頁六下）。1929年胡適稱贊張謇的成就，但謂其為失敗的英雄：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

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張孝若，1930：胡適序，頁3）。

張謇死後，劉厚生說張謇不是政治家，不是實業家，也不是名作家，而是為民服務的偉大社會工作者（劉厚生，1958:282-283）。宋希尚說，張謇未能完成其所要完成的許多工作（宋希尚，1963:8-9）。朱昌峻也因張謇死後南通的建設未能持續，而認為張謇是失敗的英雄，但贊揚張氏能超越傳統而不放棄傳統（Samuel C. Chu, 1965:176-177）。

大陸學者對張謇的評價，隨著政治情勢的不同而不斷改變。1960年代，徐崙和章開沅都批評張謇是資產階級（徐崙，1962:424；章開沅，1963:100）。1978年改革開放後，學者開始贊揚張謇具有開放改革的觀念。如：1986年章開沅極力贊揚張謇為務實的人物（章開沅，1986:240）。

張謇一生致力於實業、教育、自治工作，為立憲及共和奠基；並適時倡立憲、贊共和，有助於政治之進步與安定。張謇對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的現代化貢獻極大。尤其重要的是，張謇之以富強救國為目標的政治思想：「實業為教育基礎；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自治為立憲（後改為共和）基礎」，為本文所再三討論者，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本身，或是在實際政治上，均極具參考價值。而且從張謇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實例，也足以證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並非完全相衝突。因此，與其說張謇是偉大的「失敗」英雄，不如說張謇是「成功」的儒學憲政家。

參考資料

王爾敏

1985 〈張謇之實業經濟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6:5-30。

朱志騫

1972 《張謇的實業主張》。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李時岳

1962 《張謇與立憲派》。北京：中華書局。

李劍農

1959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宋希尙

1963 《張謇的生平》。台北：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

呂實強

1980 〈儒家傳統與維新,1839-1911〉 見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 35-83。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徐崙

1962 〈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見《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頁 408-425。北京：中華書局。

孫廣德

1982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張一麟

1966 《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張孝若

1930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上海：中華書局。

張怡祖(孝若)編,張謇著

1983 《張季子九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七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張謇

1986 《柳西草堂日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張朋園

1969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章開沅

1963 〈論張謇的矛盾性格〉,《歷史研究》,第 3 期。

1986 《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北京：中華書局。

陳志讓

1983 〈張謇在辛亥前夕政治思想的轉變〉,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285-2307。北京：中華書局。

陸惠風

1962 「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的歷史背景和經過」,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

陸耀東

1980 〈辛亥革命前後張謇的轉變〉 見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 687-70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陸寶千

- 1986 〈論張謇與南通近代化〉，見《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615-63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曹文麟

- 1969 《張謇先生實業文鈔》。台北：文海出版社。

楊立強、沈渭濱等編

- 1987 《張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趙中孚編

- 1970 《翁同龢日記》。台北：成文出版社。

楊福輝

- 1970 〈張謇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報》，1:27-42。

瞿立鶴

- 1976 《張謇的教育思想》。台北：學生書局。

劉厚生

- 1958 《張謇傳記》。上海：龍門聯合書店。

Albert Feuerwerker

- 1968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P'eng-yuan

- 1968 "The Constitutionalists,"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 143-183.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I-fan

- 1976 "Kung as an Etho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Wang Hsien-chien (1842-1928),"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 *Refor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uzo Ichiko

- 1968 "The Chines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pp. 297-313.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siao, Kung-chuan

- 1975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John K. Fairbank

- 1953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ao, Sheng-hsiung (廖勝雄)

- 1979 "The Elit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ang Chien's Subtle Promotion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政治學報》 8:249-289.

Mary C. Wright

- 1957 *The Last Standar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amuel C. Chu

1965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ndra Surdedevant

1976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self-strengthening: A Reassessment of the 1870s,"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 *Refor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eng, Ssu-yu, John K. Fairbank and others (eds.)

1954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King-kong

1957 "Chang Chien, A Case Study of Attempts at China's Modernization by the Traditional Gentry,"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publish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Chang Chien

Shun-chih S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ang Chien (1853-1926) was a native of Nant'ung, Kiangsu. In spite of the various works on Chang Chien, which testify to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role in modern China, his political thought is still not well-research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first of all, to analyze Chang Chien's political thought systematically and clearly in the hope that it may becom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o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secondly, to stimulate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depends more on basic source materials rather than second-hand data. Among various source materials, Chang Chien's Diary and The Nine Records of Chang Chie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ain lines of Chang Chien's political thought may b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dustry i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foundation of self-government; and self-government is the basis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r later, a republic).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is to make China wealthy and powerful.

Chang Chien's political thought may also be categorized into seven broad principles: taking notice of both econom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 elitism; pragmatism; the concept of limited change; gradualism; golden means; and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The paper is also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the background to his political thought, the factors which shaped it, how it developed, what influence it had on his contemporaries, and its long-term impact.

Keywords: Confucianism, Golden means, Modernization,
Pragmatism, Industry, Self-government